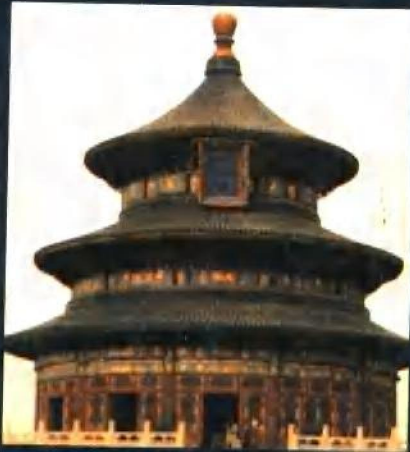


HISTORY AND ITS SCHOLARLY
APPROACH: ESSAYS BY 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中西历史

学林出版社

论辩集



(沪)新登字 113 号

封面设计：钱丽明

中西历史论辩集

——留美历史学者学术文汇 王晴佳 主编
陈 兼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江苏句容县排印厂排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04,000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80510-679-7/K·44 定价 5.85 元

HISTORY AND ITS
SCHOLARLY APPROACH:
ESSAYS BY 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Qingjia Wang Jian Chen

Xueling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历史研究和现代学术

- 代编者前言…………… 王晴佳(1)
- 1900—1940 年华北的乡村政治…………… 刘 昶(9)
- 资本主义与长江三角洲的乡村市场(1920—1940)…程 洪(34)
- 五十、六十年代台湾的土地改革……………徐 洛(56)
- 传教士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22—1928)……………徐小群(78)
- 燕京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何 迪(99)
- 中国的革命外交与美国的遏制战略
- 1949—1950 年中美两国围绕着“承认”问题的交锋… 陈 兼(115)
- 英国对朝鲜战争的反应……………翟 强(146)
- 英国革命和近代宪政主义的产生……………满云龙(166)
- 婚姻的世俗化与妇女地位
- 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婚姻改革的评析…………… 朱孝远(190)
- 制度变迁的历史困惑
- 关于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几点思考…………… 洪朝辉(203)
- 论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与人口问题……………王渊明(222)
- 博林布鲁克的历史研究……………王晴佳(239)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简论.....金旭东(255)

本书作者简介.....(268)

CONTENTS

Historical Study and Modern Scholarship: In Lieu of Introduction	<i>Wang Qingjia</i> (1)
Village Politics in Northern China, 1900— 1940	<i>Liu Chang</i> (9)
Capitalism and Rural Markets in the Yangzi Delta Area.....	<i>Cheng Hong</i> (34)
Land Reforms in Taiwan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Xu Luo</i> (56)
Missionaries and China's Nationalist Movement, 1922—1928	<i>Xu Xiaoqun</i> (78)
The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i>He Di</i> (99)
China's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Vs. America's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i>Chen Jian</i> (115)
Britain's Responses to the Korean War.....	<i>Zhai Qiang</i> (146)
The English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onstitutionalism	<i>Man Yunlong</i> (166)
The Secularization of Marriage and Woman's	

Position in Society: Marriage Reforms during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i>Zhu Xiaoyuan</i> (190)
A Historical Dilemma in System Transformation: The Dynam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gricultural Capitalism.....	<i>Hong Zhaohui</i> (203)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graphic Problems: A Case Study of the Medieval Western European Society.....	<i>Wang Yuanming</i> (222)
Bolingbroke and His Study of History ...	<i>Wang Qingjia</i> (239)
A Brief Discussion of <i>Qinding Yueshi Tongjian</i> <i>Gangmu</i> (An Outline of a Vietnamese History Written in Imperial Order)	<i>Jin Xudong</i> (255)
Contributors	(268)

历史研究和现代学术

——代编者前言

王晴佳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有过几次重大的变迁。这些变迁大体上可视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动的结果。但实际上并不尽然。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活动也会有自身的变化起伏，其原因常常植根于历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和历史研究者的代谢。如果说社会经济的更动常常会导致历史学研究对象的替换和史学理论的更新，那么历史学方法的进步则更多地仰赖于历史学本身的演化和历史研究者知识的整型。

以上的议论未免抽象，但却表示了一种明确的意向。在二十世纪走向其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学应该而且必须迎接一次新的变化。在这一次的变化中，“文革”后培养的历史学者，特别是我们这些有机会走出国门的同人，应自然地担任其主角。这是我们编辑这本学术论文集的主要意图。作为一次尝试，我们并没有在编写中明确本书的主题，而是要求作者们尽其所长，拿出他们最满意的研究成果。论文的主题可以是多样的，但其研究方法却应有共同之处。这种方法上的统一性表现为，作者开展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钻研学术，其论文的旨意也是为了增进学术。我认为，现代学术研究的精神就在于，不管研究者本人具有何种政治理念，在他从事学术研究时，追求学术性的崇高目标迫使他的研究必须基于学

术界规定的基础之上。否则的话，他的研究结果就不能看作学术著作。

以此而言，学术界应该有一些为人所承认的原则。或者说，在学者中间，应有一种自然的默契，形成一种氛围，使得每一位有志学术的人置身其间，自然而然地按照共同承认的原则开展他们的学术研究。

显然，要造成这样一种氛围并不能一蹴而就，更不是一本留美历史学同仁的论文集所能促成的。既然是一种共识，就需要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盼望本书的出版能有利于大家朝着这一方向迈进，也希望与我们具有相同认识的学人的参与。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希望不会落空。*

为了学术文化的培养和现代学术的发展，我们必须搞清几个概念问题。现代学术是与知识专业化紧密相连的，其中“现代”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时间概念，大致指十九至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现代学术的核心是知识专业化，包含有研究方法的专业化、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和研究内容的专业化。钻研知识成为一种职业，其目的是知识本身而非社会晋升的阶梯，这就保证了研究目的的纯净，也保证了研究者队伍的划一。知识专业化的必然前提是知识的专门化。这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很缓慢，尽管中国目录学早在唐以前就把天下学问分为四部：经、史、子、集，但对学者来说，其中界限并不重要。相反，能够兼通不仅得到鼓励，而且似乎十分必要。所谓“文史不分家”就是这个意思。就拿清乾嘉史家来说，他们钻研学问是毫无疑问的，但若说将知识专门化，却从未受到他们重视。那时可以说没有一人是专业历史家或专业目录学家。因此乾嘉史家没有将他们的精密考证方法用来重新撰写历史，这可以说是

* 近来国内学人渐成潜心学术的风气，专门细致的研究已有取代抒发空论的迹象，这是崭新气象。

除了政治原因以外的一个重要因素。

知识专门化的结果是使得研究者成为专家。历史学家的称号在这里就不是别人的称谓，而是自己有意识的认同。历史学家之间会形成一个有共同语言和认识的团体，组成研究机构，出版研究刊物，或者在大学里从事历史的教学和研究。这些是外部条件的发展，从其内部条件来看，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就表示研究手段的专门化和研究者的职业化。这意味着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成为历史学家，除了基本的历史研究训练以外，还要在历史研究的单位从事历史的写作、教学和研究，其作品得到历史学同行的认可。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政治家写的历史回忆录或新闻记者写的通俗历史读物都不是历史，前者是一种历史史料，后者则至多是历史教学的参考材料。

所谓历史研究的训练是指历史方法论的教学。历史专业化的特征之一便是其方法的独特性，与其他学科不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历史方法的中心是对史料的运用和对待史料的态度。这其中包含好几个方面。首先的问题是：什么是史料？史料有哪几种？历史著作的首要任务是运用第一手史料。第一手史料指的是同时代的文字和口述材料，必须与著作的主题直接相关。举例来说，如研究毛泽东，历史学家就必须首先把他的著作基于对毛泽东著作的认识上，包括其未发表的报告和笔记、日记等。因为毛泽东是政府领导人，历史学家就必须同时阅读历史档案来帮助理解毛泽东的著作和行为。其次是第二手材料，即毛泽东的家属和同事对毛泽东的回忆，以及已有的有关毛泽东的历史著作和当时的新闻报道。本世纪以来，历史史料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其原因是历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如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等等。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使得历史学家着重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叙述，其史料除了政府档案以外，还必须包括当地县志、州志、赋税记录、物价浮动信息、人

口记录、契约等等。

对待史料的态度指的是对史料的批判和解释。任何史料，包括第一手史料，都有被篡改的可能，历史学家在运用史料以前，必须对其进行一次考核审辨工作，以确定其可靠性。在遇到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相互不同的时候，应更加认真地予以鉴别，不能轻易地相信第一手史料而漠视第二手史料的真实性。但一般情况下，首先运用第一手史料是一条准则。

史料的解释问题比较复杂，其中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比较基本的，即对史料的普通认识，如对其年代、所涉人物和事件及其内容的确定。第二个层次指的是史料之间的联系与史料与史实和中心人物的关系。这牵涉到对史料的理论解释。史料运用的这一部分对历史学家甚是关键，其重要性有关历史著作的成败。历史学家必须有一定的“史识”，即理论修养，才能对占有的史料作出不同凡响的解释，从而为其作品带来新的意义。但同时，这种新的解释又不能无中生有，毫无根据，特别是不能为了联系现实而对史料断章取义，随意发挥。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有一定的理论框架常常有助于解释史料。但是，理论框架也会误导历史学家，特别是会诱使历史学家将其研究勉强附会理论的需要，因而不能服人。在这一点上，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就有其弱点。他的《历史研究》体大思精，启发诸多，但史料在他手里，都成了树立其“文化形态史观”的注脚，牵强附会之处甚多。目前，历史学家早已不把汤因比视为他们的同伍，而只是认为他是一个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的例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隔阂。许多历史哲学家的著作并未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甚至根本就没有历史学家作为其读者。这里的原因就是各自方法论的不同。历史学家无法认可历史哲学家运用史料的方法。这也体现了历史学家本身的专业化。

同时，理论框架的存在还会导致历史学家选择史料时的偏见。应该承认，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在选择和阅读史料时不带任何个人的偏见。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一部历史著作可以达到完全客观。但是，一个固定的理论框架则会使历史学家更容易在解释历史时落入其窠臼而影响自身的思考和辨别。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选择史料的阶段，历史学家就会有意无意地挑选于他有用的史料而忽视其他，这就很难写成一部全面而又有说服力的著作来。

然而，强调历史学家本身的分析能力并不是说让历史学研究停留在运用常识分析的水平上。已有的社会科学新成就常常会启发历史学家的思考，从而提高历史研究的水准，扩充新的视角。但其要求是，不能与史料提供的史实发生矛盾，也不能与历史常识发生冲突。“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就违反了许多历史常识，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总结上述议论，我们可以这样说：历史研究要成为现代学术的一部分，首先要做到学术自主，变其为拥有专业的研究队伍和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学科。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表现为历史学家运用、批判和解释史料的严肃性和重要性。

在具体的历史著述中，历史方法的特征是，历史学家给予每一条引证和每一个论证以充分的证据，其形式是注解。注解中不仅要告知读者（特别是历史学同行）材料的出处，而且要解释为什么要采用这些材料。对于别人观点的征引，也应交待清楚，这既是对别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一种言必有据的负责态度。

总之，详尽而负责的注解是一本学术著作的根本，应予以高度重视。没有出处注解的著述，只是文人随兴而来的感想性的东西，不能作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这在历史学领域，至为重要。俗话

* 笔者曾见到近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有的竟无一处注解，令人困惑。这说明国内学术态度的形成，还有待努力。

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历史学研究中，“门道”就是表现在注解中的。这是只有同行专家才会重视的部分，但同时亦是学术著作质量的根本。没有扎实的史料功夫为基础的历史议论，不管多么华丽、深刻，也只是武术中的“花架子拳”，经不起行家的敲打。

对于注解的重要性的认识是经历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的。我们可举西方学术和历史的发展为例。古代希腊和罗马，尽管文化发达，被奉为西方文明的本源，但那些先哲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著述应该受到同行的批评因而给予注解。中世纪教会历史整个都是上帝活动的注脚，其含义与后来很不相同。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开始重视古籍的校注问题，因为一千余年的中世纪已经把古典时代文化扫荡得十分严重，人文主义者不得不从各种文字和版本中，译译和恢复古籍的真面目。这种工作类似中国校注家对古籍的整理，但西欧开始注重这一问题时已经是中国的明朝了。人文主义者将自己的研究心得用小字写在古籍的空白处，因而欧洲十六世纪的古书常常是很大的开本，一页是拉丁原文，一页是翻译文字，每页四周都密密麻麻地写满研究心得，如同中国校注家用小字评点古籍一样。但后来，西方学者就开始采用注解的形式来容纳他们的研究，而将原文留给读者，以便阅读。这样一来，普通读者能欣赏古籍的文体和内容，而学者则通过注解来察看研究成果。这种传统一直为后代所坚持，因而在非校注性的学术著作中，注解的形式也保持着，其目的则一样，既为普通读者考虑，也为内行的批评提供方便。

同样，历史研究方法的发展在西方也经历过一段发展过程。人文主义者对古籍的校订方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榜样，但人文主义者只是研究古籍，还没有想到运用这种方法重新修订历史。第一个注意历史史料的重要性和史料的考订的是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他是一个丹麦史学家，后来在德国任历史教授，以治罗马史闻名。尼布尔开始运用罗马时代的口述史料和地下发掘研究历史，其视野超过古代罗马史家李维(Livy)的《建城以来的罗马史》。这是历史学家和人文主义与古籍整理者的第一次区别。

十九世纪的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朗克(Leopold von Ranke)又用历史考订方法来研究近代史，这就正式为现代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因此十九世纪的朗克史学在西方影响颇大，朗克也被尊为“历史科学之父”。*

从西方史学发展的过程来看，历史研究的学术化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其重要之处是历史研究方法的系统化，表现为注解这一形式的广泛运用和批判史料的态度。这体现了历史学发展的共同道路。

这本论文集的编辑工作是在1990年下半年正式开始的。作为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第四届年会(1990年8月)的一项计划，论文的征集工作得到了学会会员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按时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写作过程中取得了共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这本集子是一种尝试，目的是为历史研究的学术化而贡献出我们的努力。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能将所收论文作一一介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作者都是将研究的结果建立在运用和批判原始史料的基础上的，其注释形式也相对比较详备。我们期望国内同行的批评。我们相信，通过学术界同行的共同钻研和探究，历史研究的学

* 对朗克史学的研究和德国史学的发展，可见乔治·伊格斯(George Iggers)的《德国历史观念》(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美以美大学出版社1983年修订版，第63—89页。中文可见拙文《简论朗克和朗克史学》，《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术质量会有提高。这是我们在海外学习,为国内写作的主要目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会员多数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出国的学生,大都在国内受过大学和研究生院的教育。我们编写这本集子也是一个检验我们这几年在美国学习成果的机会。我们期待国内师友的批评和交流。上海学林出版社的编辑们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他们还为本书的具体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谨表示诚挚的感谢。

就我个人而言,我还要感谢中国留美历史学会 1990—1991 年理事会对此事的支持,特别是会长洪朝辉的帮助。另外,陈兼为本书作了许多联络工作,在此也一并致谢。

1991 年 4 月于美国纽约州雪城

1900—1940年华北的乡村政治

刘 昶

一、前 言

本文的主题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华北乡村的政治变迁。这一变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村政府的建立，二是村政治的恶化。前者是由二十世纪上半期国家机器的强化和国家某些职能的弱化所引起的，而后者则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扩张及华北乡村迅速的社会经济变化所共同作用的产物。

村庄政治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间关系变动的反映。长期以来，学者们在解释华北乡村村庄政治变迁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关系变动上。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更注重现代国家机器的形成和强化这一方面，并认为国家权力的扩张是这种关系变动的动力。确实，近代以来国家权力的扩张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的变动上常常起了主导作用。但是过分强调这一方面就会忽视某些重要的事实。这就是：首先，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助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一方刺激另一方反应的关系。再者，由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变动所引起的村庄政治的变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事实上，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扩张只有通过村庄政治结构本身的变化才能对村庄政治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记住这两点基本事实，我们在研究村庄政治

变化时就会同时去注意村庄共同体本身，而不是仅仅注意现代国家机器的形成和扩张。

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以前华北农村没有正式的村政府，村庄内的公共事务是由村内的会首们处理的。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由于现代国家机器的扩张，华北的村庄不得不服从各级政府的要求去建立公共学校和执行其他一些计划，并对这些计划设施提供经费、进行管理。悉尼·甘布尔把村政府的建立归之于国家权力的强制。他说，在县政府的命令之下，村长、村副这些新的职位出现了，并成为正式的村庄官员。^①毫无疑问，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在村政府的建立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否则村庄共同体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就纯粹是一个消极被动的角色了。事实上，二十世纪初期华北社会的动荡不安也是促使村庄政治朝这一方向变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一方面，村庄是一个主动的角色。

不过，村庄政府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传统的村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村庄权力的正常有效运作取决于村庄内部一个三角权力关系的相互制约与平衡。这三种权力是村内会首掌握的决策权，村政府掌握的行政权和全体村民手中的监督权。只有当村庄政治建立在三者相互制约的基础上，它才能正常有效地运转。

村庄政治的恶化正是起于这一权力结构的瓦解。黄宗智和杜瓦拉都对华北村庄政治的恶化做过研究。杜瓦拉认为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扩张和渗透极大地消蚀了地方政治权威的权力资源，使得原在国家与村庄之间充当中介并保护村庄利益的村庄领袖人物被一种生意经纪性的人物所取代。这种人物只关心钻权营私而不顾村庄共同体的利益。国家权力则容忍这种安排，因为只有这种人能同国家合作来榨取村庄。这就是华北村庄政治日趋恶化的基本原因。^②